

劳动、政治与民主^{*}

——访安东尼奥·奈格里教授

汪行福 王金林 (复旦大学哲学系 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 B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862(2009)07-0015-05

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 1933-) 是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早年在帕多瓦大学受教育, 毕业后在大学任教, 36岁任正教授。奈格里 1956年加入意大利工人社会主义党, 20世纪 60年代转向马克思主义, 是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的领导者和思想领袖。1978年奈格里因被指控主使绑架和谋杀基督教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尔多·莫罗 (Aldo Moro), 在法国避难 14年。在此期间, 奈格里先后在巴黎第八大学和哲学国际学院任教, 与德勒兹、福柯和德里达等人共事。1997年奈格里为声援狱中的难友, 回意大利服刑, 2003年刑满释放。奈格里的主要著作有: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989)、*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1991)、*Empire* (2000)、*The Savage Anomaly: the Power of Spinoza's Metaphysics and Politics* (2000)、*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2004)、*Time for Revolution* (2005) 等。奈格里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后现代主义传统结合起来, 创立起后现代革命理论, 他是当今世界最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左派活动家之一。

2008年 10月 16—20日, 奈格里应邀到复旦大学参加“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国际会议”, 10月 18日, 作者对他进行了访谈, 现将访谈内容发表于此。

汪行福 (以下简称“汪”): 《帝国》是您的第一本译为中文的著作。我理解您在《帝国》中试图为左派确立一个适当的政治坐标, 以避免左派政治学中盛行的“单边主义” (unilateralism) 与“多边主义” (multilateralism)、 “亲美主义” (pro-Americanism) 和“反美主义” (anti-Americanism) 的简单对立。您认为, 当代世界是一个由多种力量相互交织的新的主权形式构成, 这一形式您称之为“帝国”。帝国的出现显然与全球化有关, 但是, 《帝国》是如何理解全球化的, 它给我们传达的核心信息是什么?

奈格里: 对我来说, 最基本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事实, 可以说帝国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是强加在经济全球化之上的一种政治形式。今天我们已经见证了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危机, 与此相关, 传统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也陷入了危机。我和我的朋友迈克·哈特提出的问题是: 一种什么样的主权形式将强加在这种全球化之上? 这就是《帝国》一书想回答的问题。在《多众》这本书中, 我们研究的是美国在全球化中以什么样的形式强加他们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探讨到布什“政变” (le coup d'Etat) 的破产。您说我们想避免“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争论

* 该文受 985 国家创新基地课题“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本体论研究”和“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项目资助。该访谈的标题为访谈者所加, 由博士生赵伟翻译并整理。

是对的。“单边主义”通过布什的“政变”已经完成，而我们的出发点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全球化这个事实。在冷战结束后，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全球化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这里出现了三个阶段：第一，全球化；第二，布什的“政变”；第三，当今的多边主义。这三个阶段同样相对应于全球经济结构中的三个阶段。在全球化下，我们强调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到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从与工厂和物质劳动相连的现代生产方式到与非物质劳动相连的生产方式的过渡，资本也从与利润相联系过渡到与租金相联系。

汪：我注意到租金概念在您的书中提到过，我们怎样理解租金这个概念？

奈格里：租金，首先是农业生产中产生的价值。一般来讲，租金是我们从土地中获得的利润，一种自然利润。租金的差别在于同样的劳动在不同的土地上产出的多与少。实际上，租金并不限于土地，它有与土地相连的租金，也有与不动产相连的租金。比如，我看到在上海房屋的租金是很高的，因为它已经成了世界性的大都市。租金还有第三种，这就是金融租金。问题是，租金与现实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一般都认为，当今租金是与生产的社会价值相联系的。当今资本主义是租金的资本主义，如今即使利润也取决于租金，取决于证券化资产的未来收益预期，而不仅仅是物质生产创造的价值。

汪：在《帝国》一书的结尾，您把我们时代视为彻底私有化之后的逆转的时代，是共同性（commons）的新的黎明。共同性在您的著作中是一个核心概念，但是，它的意义似乎不太那么容易把握。这个概念与民众、民主以及共产主义这些概念之间是什么联系？

奈格里：我们的出发点一直就是对劳动的批判。我们认为，当劳动从物质性变成非物质性的，即智力劳动、语言的交往和社会服务时，劳动价值论再也不是一个与个体性劳动相联系的价值规律了。脑力劳动是一种非消耗性劳动，它是一种只有在关系中才能运作的劳动。非物质劳动至少有三个特征：第一，它是非物质性的，不能排他性占有和消费的；第二，它直接同人与人的相关性联系在一起；第三，它是创造性的活动。这种劳动直接构成一种共同体生活形式，我们不能将它占为己有，只能通过租金支配它。我们一般以悖论的方式探讨“资本的共产主义”的问题。因此，问题是要找到对这个共同性的定义，这种定义不再限定于一个新的政治权利场域。既不是私人权利，也不是公共权利和国家权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总是私人权利。有没有一种新的形式，使这种知识的、技术的、关系的共同性能在其之上组织起来呢？我们通常以语言为例来定义“共同性”。语言是非物质性的、共同性的和关联性的。由于语言活动本身就具有公共性，这就成了理解非物质劳动的公共性的恰当途径。

汪：有些批评者认为您夸大了非物质性劳动在现代劳动中所占的地位，在第三世界国家、贫穷国家，甚至在西方国家内部，还有大量的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劳动者，您怎样看待这种批评？

奈格里：在《帝国》、《民众》之后我将要出版的第三本书即《联邦》（Commonwealth）中，这个问题将是中心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答，在当代社会物质性劳动已经纳入到非物质劳动的价值化过程之中了。当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工业化生产完全是少数人从事的活动，但马克思把工业化生产的价值化准则运用到全部生产形式之上，甚至是农业生产形式之上。所以，你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应该以另一种形式来解释。比如，今天在中国，农民的劳动价值也会在上海的股市中被估价。

汪：在《民众》中您提到：“全球范围内民主的可能性第一次在今天出现”、“民众的民主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也许在当代思想家中，您是对当代现实最乐观的思想家，人们说您是“带着笑脸反对资本主义”。这对于一个曾经身陷囹圄十多年的人来说，实在是非同一般。在这里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民主，好像您的定义是“一切对一切人统治”，我们想进一步了解这个概念。第二，您对民

主前景乐观的根据是什么？

奈格里：当我谈论民主的时候，实际上是对民主概念进行一种斯宾诺莎式的阐释。斯宾诺莎以两种方式谈论民主。在第一种方式中，民主作为政府的传统形式之一，如谈到等级制、君主制、民主制。这种形式的民主是传统政府形式的一种。在这之外，斯宾诺莎还讲到一种“绝对民主”（*démocratie absolue*）。这种绝对民主在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那里也能找到。它是指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相混合的民主。它指一种对劳动再占有的政治形式，一种能超越异化的政治形式，是一种对“共同体”进行直接管理的政治形式。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民主的。这种民主不是西方世界自由主义的、传统制度上的民主。我认为共产党员对民主概念的理解是重要的。

王金林（下简称“王”）：您在书中谈到人人自治，怎么理解自治与民主的关系，到底怎样实现人人自治？

奈格里：这是一个敞开的问题，今天我们有可能以新的方式界定它。当我们谈论个人自治的时候，我们应该将之与言论自由的能力相关联，也就是说是与他人的关系中来理解的。因为劳动概念是一种共同性劳动。所以个人自治问题等同于自由问题。重要的是，个人自治不是一种僵化固定的东西，而是一种可以随着所有社会关系发生变化而变化的东西。比如说，殖民地国家的社会运动就是很重要的经验。殖民帝国主义惯用自然特征制造对抗，比如白人对抗黑人，一个种族的印第安人对抗另一种族的印第安人，男人对抗女人等，这些都是人种上的自然特征，是固定的。而在拉丁美洲，在玻利维亚、秘鲁发生的社会运动就不是根据自然特征区分的，男人与女人团结起来，形成真正的“多众”。“多众”的概念我们可以在斯宾诺莎的理论中找到，同样也可以在印第安人的反抗运动中找到。

汪：您非常强调“多众”与“人民”（*people*）、群众（*mass*）、工人阶级（*worker class*）等概念之间的区别。我想知道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理解“多众”这个概念。

奈格里：我们将“多众”理解为单一性（*singularity*）的集合，不是个体的集合。如果没有“共同性”这个概念，人的单一性就不可能。这种单一性是共同性的一个方面。在德勒兹那里我们能找到这种特殊的单一性概念。德勒兹去世之前，他正在着手写一本叫《马克思的伟大》的书。在其中，单一性的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单一性概念与关系的概念和抵抗的概念相联系。所以，通过“多众”这个词，我们想保留多样性的含义，也就是说，所有单一性的集合。而在现代社会，“人民”是一种统一的、实体的、无机的概念。当我们对“人民”概念做谱系学或考古学研究，就会发现“人民”是指有政治权利的那些人。但是，具有政治权利的人仅是那些具有所有权的人。穷人是没有权利的，穷人不属于“人民”一部分，女性也不属于“人民”一部分，黑人、奴隶等都不属于人民。“人民”概念具有很少的代表性。除人民概念之外，还有民族概念，我仅从欧洲的经验上来谈论民族概念。我觉得对第三世界来说，民族概念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在欧洲经验中，民族是与侵略和战争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暴力的同一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主义才成为一面革命的旗帜。我们经常说，“多众”不存在，“多众”是我们做出来的。

王：那么“多众”概念和工人阶级概念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是冲突的，还是说工人阶级可以是多众的一部分？

奈格里：我们认为“多众”概念是一种阶级概念，但并不仅仅指工人阶级。我们研究的中心始终是劳动和劳动力，是劳动形式的转变赋予阶级概念以意义，无产阶级概念也要放在这个基础上理解，因为生产主要不再是工人的劳动生产，农民、女人、学生、科研人员虽然不属于工人阶级，但是他们属于社会劳动力的一部分，属于劳动阶级。

汪：您说从《帝国》到《多众》的秩序正好是对霍布斯的从《公民》到《利维坦》秩序的颠倒。这种颠倒反映了两个时代的深刻差异。霍布斯的工作是从初生的阶级到主权的新形式，您的秩序是从

主权形式到新的全球社会。我想知道，这一全球社会就是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提出的世界主义吗？

奈格里：霍布斯属于国家理性一类的思想家，其实在他的规划中，我们已经看到新的阶级。而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开放性的。福柯说过，我们不是从概念开始，而是从“部署”（dispositif）开始。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觉得康德《论永久和平》的基础提纲是抽象的，他的概念是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而我们的全球社会始终是以作为大众的劳动者的力量为基础的。

汪：如果我判断正确的话，在法国哲学界正在出现斯宾诺莎主义的复兴，这种复兴与福柯、德勒兹等人的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理论相结合，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有别于英美规范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取向。这一取向核心是把斯宾诺莎的政治伦理力量置于生命、非物质生产、交流（communication）甚至流放（exile）等活动之中。您的思想是否也带有斯宾诺莎主义的色彩，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是，您的政治哲学的哲学基础是什么？

奈格里：我们从后往前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本人来说，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我已经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20世纪60、70年代之间，我对马克思做了很多研究，然后加入到反斯大林的左派阵营，组织工人运动。我曾经到工厂里与工人一起劳动，这些经历是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准备。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遭到指控，后来我被关进了监狱，在那里，我开始研究斯宾诺莎。因此，斯宾诺莎的思想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一种修补，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转变中起到了促进作用。除斯宾诺莎之外，我们还对语言哲学做了很多研究，我们对除海德格尔之外的所有东西都感兴趣。所以，在西方国家，特别在法国，对斯宾诺莎的重新阅读是很重要的。这一过程从马塞隆（Alexandre Matheron, *Individu et communauté chez Spinoza*, 1969）开始，然后到德勒兹。但在此之前，阿尔都塞在其研究中已经提到过斯宾诺莎。阿尔都塞特别强调斯宾诺莎对神学目的论的批判。而在德勒兹那里，着重点则是存在的生产性。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我们与斯宾诺莎相关联的地方。这完全是与海德格尔相反的。海德格尔要我们向死而在，我们强调的是向生命而在。海德格尔的东西在德勒兹那里都能找到其对立面。这些都是我在监狱中研究的重点。

汪：刚才您谈到您是先阅读马克思，然后才接触斯宾诺莎的，并说斯宾诺莎修改了您的马克思主义观。我想知道在斯宾诺莎那里，什么样的核心概念或重要观念修改了您的马克思主义观？

奈格里：这里先讲一点题外话。二战结束后，哲学上的争论主要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时已经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释。尤其是萨特和梅洛·庞蒂的断交很能反映这个特点。因为梅洛·庞蒂把卢卡奇解释为马克思主义新传统一方，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与辩证法、哲学的联系。然而，在意大利，理论研究和工人调查结合很紧密。我觉得争论的焦点就是反对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决定论。我们认为应该把资本的概念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概念，或者从马基雅维利和葛兰西的观点来看待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应该研究资本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与德勒兹、福柯还有我的一些朋友都是在这个问题上重理解斯宾诺莎的。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也是“帝国”概念的基础，因为是“大众”的斗争改变了历史。对国家的分析总是应该与斗争相联系。因此，这完全是一种坚定的、清醒的反映决定论。关于生命和肉体问题，德勒兹的斯宾诺莎主义不是一种生机论（vitalisme）。至于哲学与生命的关系，德勒兹和我们的观点不是像生机论者那样：生命可以体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而是把它理解为力量，而不是形式。在此观点下，我们可以理解单一性的自律。

汪：《帝国》出版后引起很大的轰动，在激进哲学家中也引起很多争论，比如齐泽克（Slavoj Žižek）质疑您的大众民主能否作为抵制全球资本主义的模式；鲍勃·雅索普（Bob Jessop）认为您的《帝国》实际上是对美国全球霸权和新自由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辩护；萨米·阿明（Samir Amin）认为您的《帝国》不过是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政治上仍然是大西洋主义。他们都强调左派的复兴需要与《帝国》和《大众》之类话语决裂。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我想请您谈谈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

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看法。

奈格里：我认为齐泽克从未读过马克思的书，最多仅读过《共产党宣言》而已。但是阿明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阿明是一位很优秀的独立的经济学家和反殖民主义者。但是他的政治理论已经被历史打败了。胜利者是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根据这些经验，我们应该研究一种和阿明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理论。比如，我的朋友巴西总统卢拉，我们是在我在巴黎流放的时候认识的，现在还会碰面，我觉得卢拉现在所从事的事情就完全和阿明不同，是很了不起的工作。现在，在拉美仍有很多人对于卢拉的社会运动有异议，我认为这些也都是开放性的问题，可以商榷。

汪：理论的发展总是与历史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在您的著作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特别紧密。您的《帝国》与世纪之交的反全球化运动有着重要的联系，您的《多众》与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全球反恐战争有重要的关联。我们知道，2008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由美国次级债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有些人认为，这证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破产。您如何看待这场金融危机，它会让您改写自己的思想，还是更坚定了您现在的思想。

奈格里：所有我们刚讲过的这一系列东西似乎都表明我的观点应该是更坚定了。但是，我仍然不是很确定。金融危机是我已经预见到的。我们很快会把《联邦》一书的书稿交给出版商，在这本书中，金融领域是最根本的讨论主题。我们要把金融领域的危机与美国的危机联系起来，也就是与美国单边主义的危机联系起来。多边主义世界是指什么呢？从政治上来说，怎样有所作为，也就是“如何做”的问题。我不敢自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我可以将它作为谈论的主题提出来。就像《帝国》与反全球化相联，《多众》与反美国的战争相连，现在我们提出另一个问题：怎样在这个新背景下即多边主义背景下斗争？我觉得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思考全球化现象比思考与国家一民族有关的现象更为重要。比如，当今的金融危机就表明了国际背景下资本的统一。没有再回到过去的可能。

王：您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哪些是对您影响最大的？

奈格里：对我来说，第一，重要的是劳动的存在论价值。第二，是资本的概念，作为一种开放的辩证概念。第三，重要的是经济因素与生命需求的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从哲学上讲，作为劳动的经济因素成为了构建社会的最基本中心之一。

(责任编辑 徐亚莉)

《中国分析哲学》即将编辑出版

为了推进我国的分析哲学研究和教学活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分析哲学》，英文名称：Analytic Philosophy in China，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联合协办。《中国分析哲学》将成为国内学界发表分析哲学专业及其相关领域的学术论文、译文、消息、资料等的一个主要平台，也是国内哲学界与西方哲学界开展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国分析哲学》欢迎国内外学者踊跃投稿，也包括国内外学者的外文文章，特别欢迎国外学者的首发外文文章。每篇中文文章字数最多不超过3万字，外文文章篇幅不超过25页。目前计划每年出版一集。《中国分析哲学》将以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为主体，成立学术委员会，采取双盲审制度。来稿一律通过电子邮件附件用office word 2003文档格式同时送往以下两个地址：jiangy0512@126.com和 yininkui@126.com，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中国分析哲学》投稿”。来稿四个月后未收到用稿通知，可另行处理。文章一经采用，略致薄酬并赠样书一本。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
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

2009年4月20日